

2013年度

文艺评论工程项目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编

中青年文艺
评论
文选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3年度

文艺评论工程项目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编

中青年文艺
评论
文选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青年文艺评论文选. 2013 年度/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 3

(文艺评论工程项目)

ISBN 978-7-5154-0432-5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2828 号



CHINA LITERATURE
AND ART FOUNDATION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

资助项目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胡志华
责任编辑 胡志华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志 远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 印张 3 插页 40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 目录 |

排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知遥 | 冯骥才：让中国文化获得世界声誉 / 001

牛寒婷 | 精神病象下的灵魂诉说

——评陈国峰的实验话剧《精神病患者》 / 005

王 迅 | 艺术灵魂的突围表演

——残雪小说精神形态分析 / 013

王 菱 | 雪山：康巴之魂与信仰之索

——评泽仁达娃长篇小说《雪山的话语》 / 022

王凤英 | 万里云罗群雁飞

——2012年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述评 / 029

王宏伟 | 与其所谓“创新”不如提倡“复古” / 036

王灵均 | 程长庚舞台艺术钩沉与京剧史地位再探讨 / 040

王俊虎 | 论延安文学经验的当代承传

——以陕西文学为例 / 054

王晓静 | 精神之乡的不懈构筑

——读杨梓《骊歌十二行》 / 067

卢 楨 | 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新诗审美 / 072

申霞艳 | “梁庄”与中国想象 / 084

白 锐 | 当代书法“炫技风”的反思 / 096

冯希哲 | 杨柳列岸风香透

——论陈忠实的文学批评观 / 100

刘 军 | 《非常在》：暴风雨从内部迸发 / 107

刘 勍 | 北京绢人：不要成了“临去秋波那一转” / 112

刘卫东 | “底层文学”向何处去？ / 115

刘长华 | 唐湜：别样“人性复纯”论者的思诗

——从“风土故事”中构建中国的狂欢诗学与牧歌 / 124

刘宗超 | 由“道”到“技”：书法的古今之变 / 134

刘复生 | 穿越历史的“青春之歌”

——意识形态变迁及《青春之歌》的再叙述 / 138

刘晓真 | 2012看中国舞蹈脉动 / 149

孙立生 | 大地与种子

——从“曲艺之乡”的话题说开去 / 156

孙新峰 | “带灯”等“天亮”

——论《带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 162

朱 杰 | 刘复生的“当代文学批评” / 177

衣 郎 | 如果有一天回到大地 / 187

江腊生 | 文学反思与话语焦虑 / 191

李 晶 | “新文人书法”的当代语境初探 / 202

吴正锋 | 沈从文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与艺术的成熟 / 207

何 英 | 未完成的理论任务 / 216

谷海慧 | 田沁鑫剧作论：基于文本与舞台的双重解读 / 219

张丽军 | 未完成的审美断裂

——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 / 231

张柱林 | 焦虑时代的精神表征 / 245

卓 玛 | 情调叙事中的文学加减法

——江洋才让短篇小说简论 / 253

罗小凤 | 诗言“感觉”

——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 / 260

周 徐 | 抵近当下军旅生活现场

——谈新生代作家的现实军事题材创作 / 278

房 伟 | 梁庄与中国：无法终结的记忆

——评梁鸿的长篇非虚构文学《出梁庄记》 / 282

胡凌虹 | 困境与生机：上海戏剧编剧生态考察 / 291

胡颖峰 | 赣鄱的福地 她们的文学

——三清女子文学研究会散文创作述评 / 306

徐仲佳 | “临屏写作”的魅力与陷阱

——评蒋子丹新作《囚界无边》 / 311

殷常青 | 一种灵魂扎根、人心落实的写作品质

——谷地诗集《石油的名义》读记 / 319

唐翰存 | 文艺评论的个人化与人民性 / 326

龚奎林 | 人文关怀与问题反思

——陈世旭创作论 / 331

董迎春 | 论现代诗歌的幻想性与艺术书写的可能 / 339

慕 羽 | 陶身体剧场“数位系列”：隐匿身份 突出身体 / 349

谭 昶 | 莫言：不能说的 / 355

熊 立 | 中国电影理论的知识品质 / 358

颜 榴 | 孙维世的火焰 / 368

潘 磊 | 打工诗歌中的中国梦 / 375

马知遥 | 冯骥才：让中国文化获得世界声誉

早在1994年始，冯骥才就发起了天津的老城保护运动。因为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形成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在经济大潮中旧城成批地被拆毁，作为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对文化的前瞻性认识，他会对周围的世界视而不见。他完全可以继续他的散文和小说创作，作为当时早已成名于文坛的冯骥才，仍旧会一如既往地文学道路上继续收获他的精彩、用他的画笔创造作为中国当代文人画代表人物的辉煌。但他走出书斋，走到了大地上，他注意到了社会的变化尤其是城市的变化。如果没有人挺身而出为城市说话，很可能一夜间天津老城就成为一片废墟。是他最早地吹起了老城保护的号角，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在媒体和广大市民的参与下，天津老城部分地方得到了保护。

有了前瞻性的思想却没有任何行动是不够的。中国知识界的惰性常常体现在，习惯于从书斋中寻找文献却从来不愿意对周围的世界多一些关切的眼光。由是我们经常性地看到一些专家的主张仅仅是说说而已并不能付诸实践。冯骥才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行动力。他提出并要亲力亲为。他必须将自己的想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或者实现。从历史的脉络中我们能看到过去20年前的场面，他用自己的稿费雇请专家、专业摄影师百人之众对天津老城进行了彻底的拍照和记录。他甚至为了保护某处拆迁的老街到街头演讲，发动市民们一起保护自己的历史。他编辑出版了《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天津老房子·小洋楼风情》、《天津老房子·东西南北》。把思想在行动中实现，冯骥才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了这一点。

随之而来的是他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呼吁,以及从2002年开始到2011年结束的近十年的中国木版年画抢救工程。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龙头,中国木版年画抢救工程做了一个很好的样本,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路。十年的历程其中的艰难和辛酸只有冯骥才自己知道。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卖画从事他热爱的事业。一个思想一个行动持续十多年地不肯更改,让他的文化遗产保护终于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和帮助。行动支持了他的理想。承担起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那天起,他就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工作,奔走呼喊。他从过去的单枪匹马到民间抢救工程队伍的逐渐壮大。行动是最好的证明,他用行动说服了那些过去冷眼旁观者,也带动了一批一批的民间文化保护队伍。

如果给冯骥才的十年做一个大事年表,我们将充分认识到他十年的风雨,十年的奔波和艰辛。

一个人的影响力是日积月累的过程。影响力不是明星的流星效应,一闪而过,它代表一种持续的人格的魅力和思想深度。冯骥才是作家,在广大的读者中有广大的影响力,而他这个作家之所以比一般的作家影响要大得多,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是他有三十余篇文章被选入了中外中小学教科书。中国一代一代的中小学生们在读书期间大多读过他的作品。这是一个作家值得骄傲的事情,也因此会给广大读者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冯骥才作为画家和作家投入到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中,一干就是十多年,他唤起全民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保护意识,这也是他产生影响的一个原因。但问题是,很多比冯骥才资历更老的专家学者,他们也在从事着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但在公众中并不能产生影响,原因恐怕与冯先生长期以来扎根田野,将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有关。同时他还充分利用媒体不断传递自己的思想传递自己的声音。在一个网络媒体的时代,在知识分子普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时代,必须将自己的前沿思想通过更广泛的渠道传播,让更多人意识到你所从事事业的重要性。冯骥才用他的文字用他的演讲用媒体采访将他的理念传播。

当更多人意识到他所从事事业的高尚及艰巨,意识到文化遗产工作的必要和重要性后,冯骥才的影响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不断增长。

当一个名人有了公众号召力,并且持续不断地发挥个人影响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就产生了。而有了影响力就有了话语权,有了话语权就有了更大规模的

传播的能力。思想的传播成为这个时代最为可贵和艰难的行为。冯骥才一直在坚持。

冯骥才文化思想对当代中国文化政策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贡献是巨大的。

是他头一次提出对中国大地上的民间文化进行盘清家底的地毯式的普查，是他提出中国的民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半，是他提出为传承人进行口述史访谈并为他们立传。是他通过自己长期的田野经验提出了“民间创造，精英挑选”的保护理念，提出了“把书桌扎根在田野”，提出对中国的民间美术进行分类，建立国家文化遗产日，春节假日前延到年三十，清明节放假等等倡议。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一些建议，让这些宝贵的惠民建议成为国家法定的节日需要不断的努力。冯骥才已经前瞻性地意识到，当传统的节日得到保护的同时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的内容也会因此得到保护。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成了四级保护体系，国家名录中的国家非遗项目达到近1300项时，当各级名录非遗项目达到7000多项时，冯骥才又清醒地认识到：数字不能表明非遗工作的成绩。因为大量的严峻现实表明了官员的不良政绩观以及非遗的产业化意识影响着很多地方官员，甚至一些文化保护工作者自身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没有形成共识。一些虚假的非遗项目开始出现，一些得到非遗项目称号后完全背离传统成为适应市场的变异产品的非遗项目也开始出现，所以他提出“建立非遗红黄牌制度”，对不合格的项目进行摘牌处理；他在2011年的政协会议上又提出暂停非遗项目的审批，将非遗改为“审遗”，为的是保持国家非遗的纯正性。

此外，冯骥才对中国雕塑、民间美术、考古、敦煌学、中国画、音乐、文学等各领域的通晓，让他打通了知识的界限，让知识真的达到了为思想所用，为个人智慧和人格的完善所用。在十多年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我们仍旧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冯骥才”。他的视野是世界的全球性的，他的工作是全国性质的，他的足迹是遍及大江南北的，他的成果是带有典范意义的。他用知识分子的情怀，用对民间文化的一腔热爱带动了全民的文化遗产保护，用自己的参政议政获得了一个个正确的提案的落实，让全民共享自己的节日文化。他改变了过去知识分子只是将学问扎根书斋，不问天下的形象。

冯骥才用行动激发了一个民族对民间文化的沉睡，也让中国文化获得了世界尊重。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他让中国的文化精神获得了世界声誉，同时也让更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自己的角色和任务，这还不够。当用十年时间亲自挂帅完成了中国民间文化抢救的龙头工程“中国木版年画抢救和保护工程”之后，

他又转身到了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抢救中来。中国的民间宝藏丰富，需要一代代人锲而不舍的行动，需要永远站在时代前沿的文化先觉。

传统村落是另一种文化遗产，这是冯骥才先生独立思考并带有创造性的思想。这一主张此前在世界性的文化遗产保护中还没有被专家提出，而实际上，这是一个事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土壤在乡村，大量的具有浓郁文化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也遍及乡村各地。对乡村的生态文化、文化空间进行保护就是为传统文化留住根，留下最后一道防线。而这个主张又是如此及时。如果任由城镇化大力发展下去，如果不考虑传统村落的问题，那些受到保护的或者还没有机会保护的文化遗产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以村落为考察对象，带动的也是一种新的学风：实地调查，实物取证，整体研究，为传统村落立档，为传统文化的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创造更为优越的条件。最为重要的是，村落的保留为今后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也为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宝贵的人文风景。时间会告诉我们，冯骥才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创见在今后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中的意义将越发彰显。

作者系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教研部主任、教授，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心秘书长

本文原载于《文明》杂志2013年第9期

牛寒婷 | 精神病象下的灵魂诉说 ——评陈国峰的实验话剧《精神病患者》

我喜欢《精神病患者》这个剧，更准确地说，喜欢它的戏剧文本，因为我并没在剧场看过它的演出。它曾经的海报和剧照，让我心生向往。设计得富有创意、别具风格的海报，暗合作品的意义指向，符合它的另类气质——那黑色底纹上一只被夸张变形描绘的眼睛，如在无边暗夜中探寻真理、救赎灵魂的心灵，洞察着黑暗，也反抗着黑暗。但它的剧照却有些让我失望，除了那颇有创意的“弹坑”设计，男女主人公并不引人注目甚至有些学生气的形象，破坏了我的想象。在我的想象中，“男人”高大威武、英气十足，有宽阔方正的额头，有睿智深邃的眼睛，有浑厚洪亮的嗓音，有仪态万方的步履，他在一瞬间可以从神经质的脆弱变为激情四溢的澎湃，表演具有收放自如的戏剧张力；而“女人”则至少高挑漂亮、身材可人，即便穿着破烂的逃亡衣衫，也遮挡不住内在的光芒和动人的魅力……是的，伴随着阅读，在我的想象中，《精神病患者》已经无数次地上演。

《精神病患者》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人”和“女人”。在战争背景下，两人带着各自的精神创伤出场，“女人”找不到过去的记忆，而穿着军装、自称为医生的“男人”则弄不清自己的身份。在避难中，两人开始交流。与“女人”一起探讨战争、秩序、文明、人性、宗教等话题的“男人”，呈现出自我分裂的精神病象：他时而为世界文明、社会秩序和战争辩护，时而质疑人类文明、消解历史、诅咒战争；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信仰上帝，渴望得到心灵的救赎，他

也质疑上帝的存在,挑战宗教的权威;他作为心理医生拯救他人的心灵,寻找心灵的解脱之道,可他自己就有精神疾患。“男人”与“女人”从一开始的互相戒备,到共同躲避战火、互相帮助,再到深入的谈话与沟通,逐渐拉近距离。在“女人”的追问下,“男人”回忆起战争中的痛苦经历,一点点恢复记忆,并以心理医生的身份,治疗“女人”,帮助她追忆不堪回首的往事。当“男人”终于恢复全部记忆,他的另一个自我苏醒,他在瞬间变身为集权、残忍、强硬的战争痴迷者,也揭开了自己的身份之谜——原来他即是发动这场世界大战,后被政变推翻政权、沦为阶下囚的一国之总统。在拥有总统、医生、基督徒、精神病人、逃难者多重身份的“男人”的胁迫下,“女人”恐怖到了极点,伺机将“男人”打倒在地,结束了这场“精神病患者”的悲剧。

有一类艺术作品,在简单的故事外壳下,以它的丰富和多义迷人。它们往往带给人丰厚的体验,让人一时看不清它的真面,以至不断产生回到作品的冲动和渴望,去探究作品之谜。《精神病患者》就属于这样的作品。它由两个人物的对话构成,通过塑造主要角色“男人”、次要角色“女人”两个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挣扎,借人物之口表达对人类文明的终极思考和深层困惑。这种思考是悖论式的,悖论也是困惑产生的来源。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为了人类生存的至善至美,为了人类与世界的和谐,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又无法逃离破坏文明本身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无法摆脱的人性之恶的梦魇。正是在战争这种彰显人类文明与人性悖论的人类活动中,《精神病患者》展开了它的精神探索与灵魂追问。作品通过对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历史、科技、权力、真相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秩序理性的大胆质疑,通过对人性的终极批判和思考,掀起一场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头脑和精神风暴,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观念和思维模式,带来陌生化、戏剧化的审美效果。更为重要的,这种理性思考和深度探寻紧紧附着于人物的精神形象,人物的个体经历和精神创伤所构成的形象的独特性、丰富性与形而上的思索紧密结合;人物的精神病象本身成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隐喻。正是这种具有丰厚内涵的形象性所具有的意义指向,构成了“男人”这一主要人物形象的戏剧张力,使他无论在舞台上还是文本中,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构成了《精神病患者》的动人魅力。

《精神病患者》是严肃戏剧。如此说并不仅仅是要把它与通俗作品区分,形成一种雅与俗的分野,而是要指出它的作品层级,外化它与众不同的独特气质。

比起当下四平八稳的主旋律戏剧和那些已然成为商业弄潮儿的小剧场戏剧,《精神病患者》并不容易被命名,它的复杂性往往使它被归为先锋戏剧一类。先锋也好,小剧场也罢,甚或是其他现实主义戏剧、主旋律戏剧,等等,这些名称和分类除了便于指称外,对于认识和研究作品来说,少有实际意义。真正的艺术作品用自身说话,它可能不属于任何一类,也无法被轻易命名(分类和命名往往出于即时的短视),但它却是一种真正严肃的创作。事实上,无论是雅与俗,还是现实与先锋,都潜在地说明了一个常识性的事实:艺术作品是分层次的。在这里,我并不想讨论作品的层级与作品的优劣这个复杂和难以评判的问题,而仅仅是想指出,《精神病患者》并不是面向大众的戏剧作品,它的主题、内涵、形式和表现手段等,都对它的鉴赏者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它抛开形而下的生活表象,远离琐碎凡常的生活细节,通过塑造人物的精神形象,抵达形而上的意义世界,追问生命和世界的终极答案。因此,它注定是“高端”的,是只属于“小众”的戏剧作品。也正因为如此,比起“先锋”这个已然被滥用得泛化了的标签,我宁愿用严肃戏剧来指称它。

《精神病患者》的严肃性在于它的心灵性。作品虽然塑造了“男人”和“女人”两个形象,但突破两性视角和二元惯常思维,依据作品的内在逻辑,便会发现——“男人”这一角色在剧中承载了意义建构的主要功能。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男人”有着多重身份,心理医生、基督徒、国家总统/军人,多重身份的背后是多重自我和多重人格的彼此冲突、交融。心理医生医治人类的精神疾患,治疗人类的心灵创伤,拯救的是人类文明发展下被压抑和扭曲的灵魂;基督徒是拥有宗教信仰的心灵修行者,追求梦想中的天堂,渴望通过心灵的救赎摆脱现世的苦难;总统是统治国家的独裁者和掌权者,是建立世界和社会秩序的执行者,更是发动这场世界大战的好战分子。多重自我的并存、冲突造成“男人”人格的分裂,分裂导致精神病象的产生,于是在开场,“男人”穿着军人的衣服,用医生的身份,说着战争的话语。正是凭借精神病患者“男人”丰满、立体的形象,作品表达了深刻、智性、动人又充满悖论的形而上的思考。人类精神的异常和疾患隐喻了人类文明的深重危机,而这个文明的世界是由人类一手创造的,是人类自身的投射和观照,文明的危机即人性的危机。“男人”形象的内在冲突隐喻了人类文明和人性的危机与悖论,但这一形象又以其生动、丰富的艺术性超越了这种隐喻。这里,人类文明与世界的危机、人性的危机、“男人”自身人格和存在的危机——这三重危机,以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悖论存在,互相勾连、

映照,却又各自独立,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意义无限延展的精神场域;不仅突显了作品形而上哲思的戏剧性、有效性,也构成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性。而作为与“男人”交谈的对象,“女人”这一形象,虽有其自身的精神病象和悲剧性,但其设置的目的是为了与“男人”形成对话和互动,在交流中激发“男人”形象的多面性及多重人格。伴随着人物自身的内在危机,“男人”/“女人”以个体生命的“小”悲剧,映照了整个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的“大”悲剧。

虽然是表现人性和生存不可避免的悲剧和绝望,虽然是以战争的形式和两性的对抗(“女人”最终把“男人”打倒在地)颠覆世界的秩序与和谐,虽然是以消解文明、世界、人性的方式嘲讽和揭露真相,但是,《精神病患者》却似在隐秘而执着地指引着一条灵魂救赎之路。剧中,当“男人”和“女人”共同诅咒战争、谈论宗教,希求通过信仰而自我救赎的时候;当“男人”作为心理医生医治“女人”,寻找人性的解脱之道的时候;甚至当“男人”作为偏执的独裁者企图以暴力和强权建立世界秩序的时候,心灵解脱、灵魂得救、人性救赎成为台词中跳跃的希望火光,警醒也温暖着心灵。虽然拼凑了各种文化因子和宗教元素的教堂,最终在“男人”和“女人”的面前倒塌;虽然哲人有言只有死亡和疯狂才能让人解脱;虽然人类的自我拯救也许终究需要悖论式的文明的不断发展……但是,救赎之路却最终能够在人的心中缓缓地打开。就像剧中那句闪烁着伦理智慧的台词“当你手中(心里)握着武器的时候,天堂就永远也不会出现”,还有引用的佛家的顿悟之语“一念之差,即坠入无间地狱”,它们都在一瞬间,触碰了辗转于苦难、绝望、困惑的心灵的柔软角落,激发了人性自我完善的动力。真正的天堂只存在于人的心灵中——这是《精神病患者》在刹那间带给我的透悟与净化、感动与升华,在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中,在灾难世界的毁灭和颠覆中,这就像一种来自圣界、超越尘世的声音,一种个体生命深处的自我呢喃与灵魂诉说——它像西西弗斯的神话,像俄狄浦斯的命运,也像每一个凡常的向死而生的生命本身,绝望中透着希望,艰辛中更为执着,凭借原初的生命激情与力量,对抗世界与人性自身。在此,悖论性的表达与诉说,透过形而上的心灵追索,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

“悖论性”是《精神病患者》自我生成、自我表达的原动力,也是它审美表现和自我标榜的密码。作品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尤其是准确、精致、细腻、深刻、智慧的对白,拓展台词的意义空间的同时,构成一种戏剧语言的悖论性。人物心理的纠结挣扎和精神上的自我对抗,通过哲思语言准确生动地表达出来,

呈现出形而上的高贵气质，人物语言也因此具有双重的意义指向——它既是戏剧层面人物间的对话与心理指涉，又是哲学和人生的意义诠释。作品对人物的精神形象即“自我”的塑造，充满了悖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多重身份和多重人格的产生是人的内在自我不断冲突的结果。“女人”的记忆混乱源于逃避真相，而对真相的逃避意味着不愿面对曾经真实的自我，对她而言，虚假的记忆与自我更能被自己的情感和良知所接受，于是，真的自我被“屏蔽”。“男人”的多重人格之间则更具有“你死我活”的悖论性，心理医生、基督徒、国家总统、好战分子——这极具夸张性的身份/性格的怪异组合意味深长。在剧情上，悖论更以戏剧性的方式表现：得了精神病的“男人”，忘记了自己的总统身份，他痛恨战争，质疑文明，追问宗教，渴望救赎，俨然拥有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心灵；而当他找回了自己全部记忆，精神病象消失，他却成为一个真正“疯狂”的人，一个偏执、残忍、可怕的独裁者。这种荒谬又“真实”可信的人生际遇，喻示了人类文明发展与人性的种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在此，人的存在本身即是悖论，人性的多面与善变成为人类自我探求和追问的永恒母题。

悖论的“自我”是支撑整个作品和人物的核心元素。“自我”是人存在的根基，它属于精神和心灵范畴，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它既是哲学命题，也是艺术问题。多重“自我”的产生，究其根本，是人的欲望所致，这是人性所无法回避的。欲望与对欲望的制衡，二者的此消彼长，是生命存在的根本形态。欲望，它可以是人性中的贪婪恶魔，预示着毁灭；也可以在人性塑造中激发人的力量，构建人的生命意义，昭示着光明。就此而言，多重自我是生命本身的绚丽展示，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生命探索，是尝试探寻不同的生命意义。人生原本就是一个不断地发现自我、探寻自我、否定自我、完善自我、创造自我的过程。个体生命在面对文明与人性、道德与欲望、理性与非理性、善与恶、是与非的选择和挣扎时，感受到多重而复杂的自我，在种种选择与放弃中自我裂变、自我成长、自我救赎抑或自我毁灭。《精神病患者》中的“男人”和“女人”在自我存在的困境中，在人性挣扎与裂变中，展示了各自人生际遇下的特殊自我，伴随他们不同自我的宣泄与释放，读者/观者与他们一道追寻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并从个体性经验的自我上升到人类“共同自我”的形而上层面，实现了生命的激越，也完成了自我的升华。

从作品的“自我”悖论中走出，与作品中更多的悖论相遇，会发现《精神病患者》是一个被有意设置的悖论“陷阱”。就像整个故事发生在宗教圣地“圣

城”，这个原本的心灵救赎之地被残酷的战火摧毁，多文化、宗教象征的教堂在战争中坍塌——这仿佛是一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战争，人性与人性自身的争夺——这一设置本身就是富有意味的，充满了困惑与悖论。从全剧看，人物自身存在的悖论性——“男人”和“女人”各自的多重自我的彼此冲突，人物语言的悖论性——精妙的台词像一场场高深、激烈的辩论，主题的悖论性——个体生命存在、人性乃至人类文明的悖论性……像一张无限延伸、没有边界又疏而不漏的网，笼罩了触手可及的现实和精神世界，观照着每一个脆弱、敏感、困惑、犹疑、不断突围的心灵。除了悖论给作品带来的戏剧效果，悖论这一命题本身就引人深思。也许，整个宇宙和世界就由悖论构成，悖论才是人性与文明的最终“秩序”；悖论也是人类痴迷于形而上思索的动力，试图摆脱悖论的纠结和苦难终将是徒劳的——“悖论情结”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人性所生长的“恶之花”；我们为悖论所苦，我们也喜欢它。这也许是《精神病患者》让我着迷的原因之一。在作品中，悖论像个孤魂野鬼，四处游荡，你看不见它，却始终了解它的存在；它像影子，紧紧追随人物的精神形象，伴随人物的精神气质，也纠缠着你无尽的思索与回味。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悖论性，带来一种深层次的荒诞感，成就了作品独特的戏剧性。

戏剧终究要凭借直接而有效的戏剧性征服观者/读者。戏剧性首要的是戏剧冲突，在戏剧文本的想象世界里，在剧场的戏剧空间中，情节上的、心理层面的和精神世界里的戏剧冲突是戏剧自我表达的关键。《精神病患者》突出的悖论色彩和颠覆性表达，不仅构建了表层叙事的戏剧冲突，更激发了一种生命和世界存在的荒诞感，而这种切近生命自身的荒诞感和形而上意味，直接构成了它与众不同、气质独特的戏剧性。人物对白的准确、生动、精细与凝练，以及它的思辨性，让人感受到语言的戏剧性——语言的一种极致表达，包括语言的智性之美、对白衔接的巧妙，还有在理性思索与人物塑造之间不露痕迹的自由跳跃，展示了台词创作的深厚功力。这种质地丰厚、闪烁着理性和智慧光芒的台词语言，塑造了男女主人公身上的独特气息，赋予戏剧文本一种内在的文学性和深广的想象空间，在激发各种形而下的、狂风暴雨般的情绪和感受之后，把身心体验引向形而上的层面，带来净化与升华。观者/读者仿佛看见两个痛苦的灵魂在舞蹈，曲终人散，灵魂依旧没有停止“诉说”。此外，作品的戏剧性还体现在情绪化的语言风暴里，语言和思想的颠覆性、疏离性以情绪宣泄的极端方式表现出来，带来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观者/读者以情绪体验的真实性认同了剧